

第一章 导 言

当看到本书的题目《中华古谋略与现代企业人才竞争》时，也许在你的脑海中会产生一个印象：这本书的整体思路无非是把古代谋略的精言妙论、典故哲思与现代企业人才竞争的文韬武略、新闻轶事相比附，并从两者之中找到某种契合点，再来一番激浊扬清，理论评点。的确，像这样思路的书刊，眼下比比皆是。可作者在这里却无意去臧否那样的书刊，因为它们毕竟在开阔视野、活跃思维、丰富知识、增长见识等方面，也给人们带来不可缺少的教益。

那么开篇便提出这样一个问题的目的何在呢？

近年来，在对待传统民族文化上，有一种实用主义的思维倾向值得重视。他们常常把博大浑厚、雅俗混杂、形而上与形而下互为包容的民族文化，用几部典籍文化而代替，进而又从典籍文化当中抽出一些哲理的论说，冠之以民族文化的精粹，并运用到现代企业管理之中，仿佛这就是从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古为今用了。这种思维模式，很容易引导人们会走入一个观念的误区，以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的建立，是一个纯经济行为，文化只不过是经济的一种手段。即所谓“文化搭桥，经济唱戏”罢了。这种实用主义的思维模式，在今天经济转型所形成的“文化落差”中是一种极为有害的倾向。当作者在对本书进行整体构思时，反复思考这样的问题：中华古谋略正面价值因素是传统文化中的一部分精华，现代企业人才竞争是面对下一个世纪的挑战严峻的现实问题，二者之间究竟是一种什么关系，难道仅仅是以古为鉴，古为今用吗？显然，这不单单是一种时髦的表现或装饰，也不仅仅是简单的肯定或否定，而是对现代化的进程中传统文化的作用力，

以及如何用现代意识正确地把握继承、扬弃和超越传统文化，作出更清醒的理性审视。如果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的建立，绝不是一个纯经济行为，而是一个经济和文化“一体化”的历史进程，那么二者之间存在什么样的内在联系？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是一场最深刻的革命，其中最艰难和最重要的是变更与旧体制相适应的旧的文化价值观。从思维方式、心理结构和价值观念作一番新的选择、组合和重构，从而扬弃中华古谋略中那些代表传统农业社会所谓“伦理型文化”的旧意识，所有这些问题都不能不使我们进行深层次的思考。

一、为什么从中华古谋略谈起

站在一个高视点对中华古谋略与现代企业人才竞争这个问题，进行具体而详细论述时，如何使读者更清楚地看到作者整体思路建构时的动因，那么，就不能不首先考虑从哪里选择论题的突破口，这不仅是确立文化反思的纬度和坐标，而且是导引读者最佳理解本书意图的入口。不妨先从具体事说几点启示，道浅说深，纵横自如。

启示之一，“红腰带”启示的文化意义：从现代人身上发现传统。

陈冲是一位生在红旗下，长在新社会，“文革”结束后，崭露头角的青年电影演员。她成名后，不久去了美国留学、拍电影。八十年代初，一次春节回国内探亲，在春节晚会上亮相时说了几句话。她告诉国人，今年是她本命年，买一条红腰带系上了，好避邪。此事当年颇受一些人的非议。陈冲在中国长期受到的是社会主义的正统教育，去了美国又耳闻目染了西方的文化，可当她的本命年，竟没有忘掉中国老百姓最常见的俗事，系上了一条红腰

带以避邪。

事隔十几年，历史走到了 1995 年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记者特意采访了一个节目。河南农村老乡，老的少的，男的女的，都急忙买红背心、红裤衩、红腰带，一时抢购得市场这类商品竟走俏。问之，为啥要穿红戴红呢？答之，今年闰八月，穿红的避邪。

陈冲与河南老乡，受到的教育，接触的世界，文化的层次，精神的追求都截然不同，但有一点相同，其身上都保留着中国传统文化基因。尽管它属于传统文化中糟粕的东西，但这种民众的文化心理因素是一种生命力的表现。文化基因，代代相继。在经济生活中红腰带、红裤衩、红背心的走俏，并不是由于商品优质，或者价格低廉，而取决于它定位在人们的传统文化心理上。像这样的事虽然很小，但它牵动的历史的渊源、文化的流变却非常之大。避邪是一种攘解活动。用某一物品产生的力量使禁忌失去动力。上至皇宫，下到民间，每年除夕，都大张旗鼓地进行驱祟活动。家家用红纸条幅写上“百无禁忌”，或“姜太公在此，百无禁忌”。还有用放爆竹、杀公鸡、悬桃木、挂艾草、晾秽物等各种各样形式来避邪驱祟。从原始社会到现代生活，悠悠几千载；从海南椰乡到北国之疆，从东海之滨到西部黄土地，幅员辽阔的中华大地，无处不有。如此说来，经济生活中的文化基因又是一个大课题。

文化基因有优有劣，有正面的有负面的，也有说不出好说不出坏的。总之，其本身都是民族文化传统的表现，都是通过对现代人的制约和支配而获得自己的规定性。这就是说，传统不是对历史的回顾和追踪，不是保存在典籍文献中，不是作为现代人的身外之物，而是历史积累和传递下来，在现代人的生活中的具体表现。由于我国文化发展渊远流长，丰富多彩，复杂多异，因而形成一个民族的文化传统和文化心理结构的长期历史积淀。而且历史愈久 积淀愈深，也就愈能显示生活在这种文化大背景下，由

于民族文化潜移默化的浸润和滋养，它在群体或个体间传承和演进中，总是体现出民族传统文化的潜意识、趋同性和凝聚力。这就是在中美两地从事电影表演的演员陈冲和土生土长、世代相袭的农民为什么能有同一潜在文化基因的原因。至于这文化基因的优劣之别，正面价值与负面价值之分，往往随着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社会的转型，特别是生产方式、经济体制的转型，在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有的会被日益冲淡，或稀释；有的会被保留、弘扬。对此，我们应当有一种现实的、理性的文化心态，既不能在巨大的经济社会反差面前失去冷静的自我评价能力，导致过激的文化批判和自我否定，也不能面对社会现实抱着冷淡漠然、随波逐流的态度。

问题是当今世界发展中国家从发达国家直接引进高科技，“物”的进步超越了时代，而国情并没有因高科技的引进，而使观念文化同步得到进步。尽管带来了强大的改革动力，但因旧的制度和传统的观念所具有的反弹力，还会阻碍和削弱高科技的应用。这就是文化滞后的现象。它说明现代化不仅要有“物”的现代化，同时也要“人”的现代化，并最终取决于“人”的现代化。人的现代化，包容的内涵和外延很广，但根本的就是提高人的科学文化素质，造就大批的现代化人才。因此，面对发展中国家的“物”的超越与“心”的滞后，就必须自觉地强化经济文化，使之尽可能减少反弹的作用。这是社会的需求，也是时代的需求。

当今中国社会正处在：一是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转型，二是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型。这两种转型所产生的文化现象有一个显著的特征，传统农业社会所形成的“伦理型文化”，重遵从，重感性，少独立，少理性，少创新，其特点是“依赖”文化。工业社会所形成的技术文化，重理性，重科技，重创造，重独立，其特点是“竞争”文化。两种文化撞击下形成“文化落差”。一方面现代工业社会和市场经济的冲击和刺激下，人们非理性的欲望迅速膨胀和上升，发财，享乐，追求物

欲和情欲，而另一方面人们的理性文化成分，如重教育，重知识，重科技，重人才。由于这些涉及到整体民族素质的因素不可能一时很快提高，于是出现了一种较低基础“文化力”渐进上升局面，与迅速膨胀的金钱欲、享乐欲上升的非理性文化之间的“落差”。君不见出国“热”，经商“热”，今天这个“热”，明天那个“热”，把国人的心都浮躁了。想发财，增加个人的收入，应当说，人们的物质利益需求的高涨是正常的，不能以压抑人的物质欲望来与较低文化素质相协调，有效的方式只能提高人们文化素质，使人们在较高理性层次上把握和引导自己的感性欲望。但眼前却出现令人震惊的忧虑，暴发户由于普遍文化层次很低，他们除了大吃大喝，尽情享受外，就是纳妾、嫖娼、赌博、吸毒；农民富了，忙着修庙、建坟。他们的子女依旧不读书，或少读书；城市里满街满巷，商品如流，但到处充斥着假货、水货，今天报纸披露假酒害死人，明天电视曝光郎中坑骗人；地方政府有钱了，有些政府官员不顾中央三令五申，忙于盖星级的饭店、豪华的宾馆，忙于购买高级轿车，忙于公款游山玩水……这一切不都意味着非理性的文化在冲击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和发展。只有缩小“文化落差”，让经济与文化一体运作，才能提高全民族的素质。

正是基于上述认识，本书写作的一个指导思想，就是立足于现代化与优秀的传统文化不可分割。有人说得好：“我们有不理解传统的自由，但没有不生活在其中的自由；……我们有宣称与传统彻底决裂的自由，但没有不在传统中开出新生活的自由”。不管你愿不愿承认，也不管你是否喜欢，每一个生活在这块土地上的中国人，当然企业家也不例外，他们的身上都带有传统文化的基因，要想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中立于不败之地，就必须让自己的头脑中传统文化的精粹积累得多一些，而传统文化的劣质冲刷和淘汰得也多一些，这样自身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必然会随之增强，使自己本身就具有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文化价值观。在一定意义上讲，市场经济就是能力经济，谁是人才，谁拥有人才，谁

就是竞争中的强者。因而市场经济体制本质上就要求并为每个人能力的平等、自由和充分发展提供了条件。特别是像我们这人口多、底子薄的国情，更要把充分开发和发挥每个人的潜力、能力当作一项带有战略任务来抓。人的能力全面发展的价值观不断提高，才对物质方面的兴趣趋于淡薄，这是现代化文化价值观的重要特征。因此，对于一个企业家，唯有如此，才能真正懂得在人才竞争中如何聚揽人才，让人才力求做到人尽其潜、人尽其能、人尽其长、人尽其用。

启示之二：“三国”谋略在日本经济文化中的作用：传统在现代生活中的价值和地位。

眼光向外每每带来全新的视野。经济文化现象与中国文化有密切相连的，当推日本。《三国演义》在日本称为《三国志》。日本的大街小巷中许多五光十色的广告牌上，在形形色色的电视录像片中，都有《三国志》醒目的文字和形象；出版社也印行了各种版式的《三国志》，几乎是家喻户晓。这不仅反映了日本人对《三国演义》的喜爱，而且从他们喜爱的“热点”上可以看出：日本人非常重视《三国演义》蕴藏的丰富的人才学、谋略思想和竞争意识。

现代各国之间的经济竞争和科技竞争，归根到底是人才竞争。谁想在竞争中保持优势，谁就必须拥有人才优势。世界著名美籍华人科学家杨振宁同他的老师泰勒讨论过世界各国科技发展成功的因素，泰勒认为一个发展中国家，最重要的并不是资金。如伊朗这样的国家，钱很多，但并不代表他们的发展有灿烂的前途。相反，日本和西德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经济都极端困难，可是经过30多年的努力，经济实力已经遥遥领先。这主要是因为他们重视教育，重视人才，重视国民素质的提高。在这种大气候的影响下，日本企业家很欣赏三国争雄，因为他们各自都掌握一派人马，生产一种产品，占据一席市场，要想在现代商战中执牛耳，首要的

就是争取人才，精诚团结，减少“内耗”。据有关报道说，有位日本财界人士说过：刘备论文武之道，临阵决战不如孙权，谋略文才不如曹操，他之所以能割据称雄，实赖于他善于知人、察人。他与关张桃园结义之法，对孔明三顾茅庐，对赵云、黄忠大加重用。正是五虎上将对他的拥戴，才使他称雄一方。桃园精神是刘氏王朝生存之基础。现代商战日益激烈，企业要想生存发展，桃园精神实乃生命之所系。因此，逢年过节之时，不少日本企业的头头脑脑都把带领部属到关帝庙烧香磕头，看作是一件重要的事情，目的是强化“桃园精神”在企业的意识。从《三国演义》中吸收和借鉴谋略，应用于经济竞争之中，这方面理论著作有城野宏的《三国演义的人际关系》、中野直祯的《三国志的智慧》、日本经济月刊编辑的《三国志——商业学的宝库》等，都给企业家不少的启示。一位日本教授指出：松下幸之助就是因为善于运用诸葛亮的谋略，而使松下电器公司成为世界大企业的。社会工业研究所所长牛尾治郎说：无论在国际或国内，日本企业要增强竞争能力，就得学习和应用《三国演义》。中国文化传统在日本经济生活中产生的积极效应，实际上就为我们认识传统，并客观地对文化传统的东西区分精华和糟粕提供了客观的参照系数和定位尺度。

将日本对《三国演义》的应用研究大略地扫视之后，获得一个深刻的印象，日本经济界很善于用中国古代文化的精华滋养自己，他们不单对待《三国演义》是这样，对《孙子兵法》、《易经》、《论语》也是这样。有一位叫涩泽的企业家随身携带《论语》，并公开宣称他的目标是“把现代化企业建立在算盘和《论语》的基础上”。日本的管理学家村山孚在中国和日本都曾作过《日本管理现代化和中国古典思想》的学术报告；伊藤肇撰写了《鉴古知今 中国圣贤经营管理理念》、《东方经营学入门》等书。其他研究中国古代管理思想的学者和著作还很多。八十年代以来，人们寻根追源，发现日本的许多管理和经营思想、战略和战术原则，都是从中国的古代文化中学到的。日本经济生活与古老的中

国文化有着如此紧密的联系，就形成了日本经济文化的特点：融合东西方文化的多元要素，与日本土著文化传统的有机结合。兼收并蓄，相互补充，相得益彰，焕发出的文化精神，就是抱团，好学，进取，向上，从而形成的团队精神为日本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坚实的社会文化基础。

日本在对待中国传统文化的态度，值得我们非常注意的是，它不是照搬和模仿，而是经过自己的思想和选择，汲取外来文化有价值的东西，而被重新加以创造，更合理地适合于日本的经济生活，更顺应时代潮流的发展。那么反观我们自己，难道对自己的传统文化就不能使其精华在现代化的进程中注入新的血液、新的生命。所以，重要的问题首先是要客观地判断传统的东西在现代生活中的价值和地位，即看它在何种程度上制约着现代人的生活？并以何种方式在体现着历史文化基因。只有通过当代实践及其效应的科学分析，才能促进我们对传统的东西达到高度自觉的认识。

启示之三：英国人李约瑟写中国科技史提出一个值得探索的历史课题：时代又一次提供给我们重新认识文化传统和我们自己的一面镜子。

英国著名学者李约瑟 1942 年来到中国，开始研究中国科技技术史，从那时起一大卷又一大卷的巨著不断问世，是至今中国最完备最详实的中国科技史。毕竟是外国人研究中国科技史，中西文化碰撞使他敏感地提出了一个重大的历史课题：为什么中国科学技术曾经有过非常光辉的年代，它的许多著作和成果，曾在世界科技史上长期处于遥遥领先的地位，然而却在十七世纪（明末清初）以后落后了？

杨振宁先生曾在一次讲话中简单地说过这个问题，近代科学的发展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假如一定要说它有个诞辰，最好应定为 1687 年，那是伟大的科学家牛顿出版完他的划时代的著作——

《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的一年。《原理》把人类带到了一个新的领域，其重要标志是，自然界的规律可用准确的量化语言来描述。这使得十七世纪的欧洲飞速发展起来。牛顿《原理》的结构完全是按照着希腊欧几里德的《几何原本》结构写的，比牛顿出版《原理》还早 80 年。当时已有徐光启和外国传教士利玛窦正在翻译《几何原理》。他们翻译了前六章，把西方科学思想第一次引入中国。今天我们所用到的一些术语，如几何，直角，平行等，都是他们两位最初翻译的。《几何原理》共十三卷，直到 1857 年，后几卷才被一位叫李善兰的中国人翻译出来。其间再无重大的科技思想引入中国，所以到了鸦片战争，中国已完全不能再同西方抗衡了。但杨振宁这段话显然只是从科学技术进步和交流这一角度讲的。

1943 年李约瑟见到翻译《资本论》的王亚南，向他讲出自己的见解，中国的科学技术在十七世纪以后落后的原因，是中国与欧洲的近代发展不同，即由于封建社会不同而形成的。所谓不同是指中国经历的是一个官僚政治的封建主义社会。由此王亚南开始研究，1948 年出版了《中国官僚政治研究》。遗憾的是不仅王亚南的研究不合时宜，而且李约瑟的研究中提出的问题也未能引起应有的重视。中国解放后有相当长的一段时期仍旧是封闭文化，它对经济的发展起到了制约的作用，这是显而易见的。这虽然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但从中日两国经济发展史上出现的一组严峻数字的对比，也不无启迪：

1956 年国民生产总值，日本与中国相近；

1980 年国民生产总值，日本为中国的 4 倍。

而正是这二十年的时间里，由于人们知道的原因，使中日两国经济发展出现了反差。

今天，我们重提这段往事的目的，是想让人们重新思考李约瑟提出的问题，为什么中国落后始于十八世纪？落后的根本原因是什么？落后带来的灾难又是什么？这些基本的问题虽然是一个

十分复杂的问题，但我们粗线条地廓清一下，对本书的论题的研究是大有好处的。

十八世纪是人类社会从农业文明开始走向工业文明的，是人类历史上的分水岭。以英国的产业革命、美国的独立战争、法国的大革命为标志，西方社会在发生质的变化，资本主义制度确立了统治地位。但因产业革命刚刚开始，工业文明并未立即表现出明显的优势，而中国是一个地广人多的文明古国，又值康、乾盛世，其综合国力还是相当强大。假如只是投影在历史表面现象，很难分出高下，但当透析长时期深层涌动的潜流才能把握历史的本质。中国落后始于十八世纪的根本原因，是西方国家进入资本主义，而中国仍处在封建社会的晚期，呈现出封建宗法性的农业社会特征，所以表面现象也许难以高下，但实质的差异已拉开距离，而且随着时代的进步，这种差异也越来越大。

当世界进入新纪元之际，中国并非没有近代因素的出现，但封建官僚政治严重地阻碍了近代因素的成长。十九世纪后半时期起，随着洋务运动，直至维新变法，新教育、新文化的兴起，新知识阶层的涌现，已形成了一股不可抗拒的力量。尽管维新变法很快就被以西太后为首的封建官僚顽固势力镇压下去，但是标志近代因素的改革措施还是在艰难地向前发展。1895年中国创办了北洋大学，后又设立南洋公学，创办京师大学堂，大力发展科学教育，培养各类专门人才，以兴国力，振奋民族精神。还大批派出留学生。到1906年，短短十年，出国留学学生达万人。这些措施对中国二十世纪的发展，奠定了一个良好的基础。日本明治维新与我国时间上大体相当。但后来的发展，尤其在教育和科技上远不如日本。这不能不归于封建官僚政治及其传统的经济、文化结构的阻滞。

十八世纪以来中国落后的表现是多方面的，其中最为突出的是：整个国民在封建官僚强权政治下独立意志和创造精神的压抑，人才，尤其科技、经济领域人才的匮乏。在自然科学领域，欧洲

出现了牛顿、莱布尼兹、富兰克林等一大批科学家。他们对自然界客观规律现象和运动规律取得了正确而系统的认识。这是人类利用和改造自然界决定性的一步。瓦特发明蒸汽机，使人类摆脱了对自然能源的依赖。机械的发明创造开辟了近代大机器的工业生产。这是完成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飞跃的物质前提，而中国的知识界对此却茫然不知，几乎无法产生新型的科技人才。在社会科学领域，欧洲产生了洛克、伏尔泰、孟德斯鸠、狄德罗、卢梭、亚当斯密、康德等思想家、哲学家，他们呼吁自由、平等和理性精神，呼唤和支持社会变革。十八世纪末美国和法国先后制订宪法，保护公民的平等权、财产权，加速了社会变革，促进了经济发展，强化了法制精神。而中国正处于君权独揽、官僚统治之下，乾隆四年颁行了《钦定四书文》，以四书五经为内容的八股取士制度牢笼知识分子，乾隆五年颁布《大清律制》，强化文化思想和意识形态领域的专制统治，扼杀大批的人才，造成人才匮乏，不可避免地成为这个时代的悲剧。

上面讲了三个具体的事例，它们从不同的角度启示我们：

其一，传统文化既是一个多样性的复合体，又是历史的积淀。在我们的身上犹如一种文化基因，代代相传，谁也不能不承认它，谁也不能否定它。传统是个既存的东西，我们别无选择，就像无法选择自己的父母一样。由遗传带给我们的基因，无论是优势还是缺陷，虽然无法拒绝，但可以变革，在扬弃中继承正面因素，在继承中扬弃负面因素，用现代化的意识和精神去整合、去统一、去进步。因此最重要的是善于从现代人的心理、思维和价值中去发现传统的东西。建立一种现实的理性的文化心态，以科学的、冷静的态度进行文化反思和文化比较。正是基于这种认识，我们从中华古谋略谈起。

其二，有人说日本文化是杂种文化，我们说这也许正是它的优长所在。每一种文化的进步，都是依靠外来文化来补充，从而形成杂交优势，丰富和变革自身退化的因素。总是对适合本民族

特性及其发展的文化方向选择，进行互补和整合，建设和培养出自己的有效的文化。一个国家传统文化越悠久，文化要素越丰富，那么就更有包袱和财富的二重性。当它通过对现实生活支配和影响而转化为客观存在形式的时候，既有正面效应，又有负面效应。因此，这就需要进行创造性的选择和转化工作，换句话说这种工作就是“人文资源开发”。讲现代企业人才竞争时，选择了一个切入点，从中华古谋略中重要组成部分人才谋略入手，分辨精华与糟粕，选择合理的“内核”为我所用。

其三，扫视十八世纪中国落后的历史轨迹，看清大量人才被抹杀，造成人才匮乏与近代经济运行的关系，从而更加明确世界经济格局，越来越看出人才在经济发展和竞争中才是最重要优势。商品竞争、科技竞争、综合国力竞争，归根到底是人才竞争。这个现实，也许正是历史提供给我们的重新认识文化传统和我们自己的一面镜子。当然，把握机遇，正视镜子，这是理论思维的任务。过去，我们常讲“批判继承”一语，可由于经过不断简化、滥用，因而已蜕成了一种机械的教条、实用的理论。如果仍旧照此下去，我们仍旧会重蹈历史上文化批判吃夹生饭的复辙，仍旧今天这个“热”，明天那个“热”，去追赶时髦。因此，我们必须对复杂的传统文化及其思想哲学的历程，作出综合的、客观的、整体的理性审视。这是构思本书的出发点，也是归宿点。

中华古谋略是一个很大的内涵，本书只选择人才谋略一个焦点展开。也可以说这是对人才、企业、竞争三者文化比较与反思的纬度和坐标，以下各章将沿着这一坐标纵横展示。

二、现代企业家与人才战略

在我国有一种误解，似乎厂长、经理就是企业家。这二者之间的根本差别并没有引起人们足够的注意，比如中国厂长、经理

研究会 1987 年更名为中国企业家协会，随之各省、市的相应组织也更改名称。

何为企业家？本书谈论的是现代企业人才竞争，那么这个概念就不能不首先有个明晰的认识，特别是当今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历史时期，尤为重要。

企业家的概念，企业家应具备哪些能力和素质？

这些问题国外的经济学家有过详尽的论述，基本上描述了企业家的精神以及在实施企业竞争战略中所具有的创新作用。企业家这一概念是伴随着近代工业社会而出现的。它与市场经济是相互依存、相互制约的，离开市场经济就无从谈起企业家。企业家最根本的特点，就在于他是企业战略目标的决策人，他的行为每时每刻都无不为实施战略而努力而创新。市场竞争说到底，就是各个企业战略决策人，即企业家之间的素质竞争。从这个意义上，企业家本身就是企业管理和经营的优秀人才。而且培养和造就社会主义的优秀企业家，特别是大中型国有企业的企业家，无论是对国民经济的发展，还是优化经济大环境，都具有十分特殊的意义。

而我们平常所讲的厂长、经理，很大程度上还是行政职务。我国改革开放以来，仅用了十年光景，便把国外工业社会发展百年的东西一下子引进来，其中包括各种学说和概念。企业家这个词语在各种场合也就同厂长、经理混和使用，仿佛它们是同一概念的不同词语，喊“妈妈”，称“娘”，同“母亲”一样，似乎没有什么区别，其实大不然。我国计划体制下一大批厂长、经理，尽管他们还在其位，也在“换脑筋”，去适合市场经济。可与计划经济割断肚脐之后，有的正蹒跚学步，有的踌躇满志，大显身手不凡；但更多的则是依赖国家的贷款、优惠政策，还离不开计划经济的“母乳”。有些人从形式上看，是搞承包了，但其实质不外乎是向上要政策，用一时的效益掩饰其企业管理与企业竞争，结果成为“流星”式的企业；或者在其承包期限内，拼命地“拼设

备”，完全不管今后如何；甚至有的只关心承包中每道环节中的隐性收入，回扣多少，头脑中根本没有企业的战略目标。更何况承包责任制在经济转型的初期起过一定的历史作用，但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它的弊端越来越显露出来了。这些都不是我们所指的企业家。概括地讲，企业家竞争能力的形成，主要表现在五个方面：

产品战略。即产品的市场定位，把自己的优势和市场需求相结合，让自己的产品占领市场。

质量战略。产品的生命是质量，但要占领市场，还有一个质量的市场定位问题。

管理战略。管理虽然是“内功”，但企业管理最终目的是增强企业的市场竞争能力。

科技战略。不能盲目引进外国先进设备。要立足于形成自己的开发能力和解决技术改造的效益上。

人才战略。这是企业的生命线，也是本书论题的中心问题。“企业管理创新的根本任务之一，就是如何开发更能创造价值的劳动，如何开发人这个潜力无穷的资源，其实质就是如何看待人，如何培养人的工作能力（主要是人的知识化程度），如何创造人的工作环境（包括设备、现场、程序、组织、人际关系、激励、福利等）如何满足人的各种需要。而其中的关键 是人的知识化程度。在这里，我们引入‘人才’这个概念。……人才在企业生产、管理和创新中处于中心位置，对人员和管理层次众多的大企业来说更是如此。”

目前，我国很多企业家都缺乏把人才战略作为自己企业的奋斗和发展战略的意识，从而能够系统地制定人才资源发展的策略和制度。从宏观上讲，这与当前我国市场经济体制发育还不健全有直接的关系，还没有形成人才开发与提高整体国民素质和市场

经济的运作结合起来，把人才开发与社会结构的改造结合起来，形成发展个人才能为基础的组织社会结构，使人才的社会地位受到全社会的自觉重视。“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口号虽然十年来到处被宣扬，但并未真正地受到重视，“脑体倒挂”的现象还相当严重。究其原因，还没有把人才开发、人才竞争作为现代化的重大战略的一种机制。所谓人才机制，是指个人的才能的发挥为子系统与市场经济体制其他子系统的相互作用，最后形成一个合力，促使国民素质整体的提高。人才机制与人才管理体制制定是密不可分的。所谓人才管理体制，即人才的管理方式及有关政策、法令和制度。人才管理体制分为不同的层次，其中影响力最大的是国家的人才政策和法令。一项政策对全社会都会产生宏观调控和开发功能，正确的政策可以促使千百万人的潜能发挥出来，人才脱颖而出，人才群体辈出；错误的政策，也可以扼杀大批的人才，甚至耽误整整一代人，波及几代人。“文革”就是一场扼杀人才的历史悲剧。

从微观上来讲，是企业的人才管理体制。市场经济急剧的竞争，使人才成为最重要的资源时，于是企业最重要的资产，便是人才。凡是能把这项资产管理最好的企业，将使企业在未来的竞争中处于不败之地。因为当今世界经济的发展，出现愈来愈引人注目的趋势，企业最重要的资产，不再是“物”的有形投入，土地、原料和资金，而是信息、知识和智慧这些“人”的无形投入。因此，唯一持久的竞争优势，就在于拥有人才，把企业管理得比同行更好。使用也是人才开发、人才竞争的重要手段，而且是具体的实际的人尽其才，人尽其用。当然企业的人才管理机制既受整个社会人才机制的制约，又受国家人才管理机制的影响。我们说企业家很少自觉地把人才战略作为自己企业的奋斗目标，除却整个社会、整个国家的人才机制和人才体制还不健全外，另外和企业家本身的素质有直接的关系。最近前来参加首届国际华人物理学大会的著名教授杨振宁先生说：中国已有不少人“下海”寻

求突破，对市场经济的建立起了推动作用，但这批人的总体技术素质不高。现在，中国经济向新的层次迈进，向高科技要经济效益，那就需要新一轮的“下海”人才。高层次技术人才“下海”的意义，不仅在于他们自身对经济的贡献，更重要的是它能带动科技界整体观念的转变，使科技与经济结合更为紧密。杨振宁的这段话虽然是从科技人员这一角度透视的，实际上也引发我们认识到：

第一，中国的企业家虽然对我国市场经济的建立有不可忽视的历史作用，但总体上层次不高，因为他们本身并不是高层次人才。

第二，高科技战场是中国超越发达国家的主战场，也是最后的战场。倘若没有高层次的科技人才“下海”转化为企业家，成为新一轮的“人才”，那么就很难在高科技商品市场中抢占一席之地。

第三，高科技“人才”与市场经济结合的根本，是人才开发与市场经济运作的结合，形成了整个社会的健全的人才机制。这才是现代企业人才竞争的大气候，企业家才有英雄用武之地。

三、本书的基本框架和思路

本书的基本框架分为三个部分：（一）“导言”部分，主要阐述全书的写作指导思想；（二）、宏观探讨“中华古谋略与现代企业人才竞争”，这一部分所论的问题时空跨度大，包括第二章、第三章和第四章。（三）、微观探讨“中华古谋略与现代企业人才竞争”这一部分主要用理性批判精神进行具体的分析，包括第五章、第六章和第七章。

在第一章“导言”的开篇明旨中首先提出，本书的整体思路不同于目前流行的同类书籍，都把探索的视野集聚于古代英明人

主在人才竞争中的求才之心、识才之眼、招才之术、容才之量、用才之道等方方面面，以此与现代化企业的市场开拓和经营管理相比附、相对照，谈古论今，从而在二者之间找到某种契合的意义。笔者认为，这样就自觉不自觉地导入了一个理论的误区。其误区有三：

一、古谋略是中华民族文化的内容之一，它不是身外之物，只是为我所用。而是文化基因，是中华民族的血缘，是中华民族本性的显现。看不到这一点，就看不到民族文化的特色和生命力之所在。本书第二章：“中华古谋略的大关目——人才谋略”从人才谋略的基本内涵、主体与流变，以及文化的复合、总体特征多侧面的评析，目的是从“中华古谋略”这样一个庞大而无边的范畴中，寻找到一个论题的切入角度，既避免论述起来大而无当，又能够与现代企业人才竞争接轨，形成“企业兴旺，其功在人”这样一个完整的思路。为什么要选择这样一个突破口，为的是阐明我们谈论什么问题都应该从民族文化出发，这不单是开发民族文化的能量，而且是发挥文化力的作用。

二、文化的生命，就是指文化在今天经济生活的作用力。现代企业大讲企业文化，其根本在于它不是简单地弘扬民族文化的积累，而是让企业在自己的民族文化这活生生的有机体中，向着预期的目标转化，创造物质和精神文明。这一观点体现在本书第三章：“人才谋略在现代经济运作中的表现”里。

三、那种将古代人主与现代企业家人才竞争相比附，会造成一个误解，仿佛历史上杰出的人物才能创造人才机制，从而忽视了一个历史的前提：社会需求才是造就人才的根本机制。离开这个历史大前提，我们只能就事论事，比如说讲三国人才竞争，什么曹操发布招贤令，不拘一格选人才；什么刘备感情投资笼络和团结当世英才；什么孙权大胆起用年轻人才等等。这样既不能洞视三国人才竞争的时代特征，又不能明示三国人才竞争在现代经济中的现实意义。因而本书专设一章谈这个问题，即第四章：“市